

此可窥见一斑。本文对京音国音之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分析，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背景和角度。

【论 文】

莫把汉学当国学¹

曹 兴²

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成为党的十八大的主旋律之一。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包括识别国学与汉学、汉学与儒学的区别，弥补民族研究学领域汉族学研究的空白，防止大汉族主义在潜意识层面的恶性膨胀。

一、混淆汉学与国学的危害性与汉族学空白

在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应把汉学视为国学。中华民族文明要复兴，复兴的内容不止是于汉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以往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汉族学的空白。在非民族学界即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史学界等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即认为汉（族）学即中国学，汉族即中华民族。其实，汉学是中国的国学之一，也还是国学之一，而不是国学的全部。汉学与国学的混淆必定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甚至是隐藏着很大的危害。

当中国和平崛起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的民族团结问题，其间要慎防大汉族主义在潜在形态的盛行。当然，混淆汉学与国学不能被视为有意识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但不能否认这种误解背后，隐藏着潜意识深层的大汉族主义意识，潜藏着对汉学与国学应予区别的重大无知。这种无知，无论是对中国的国学，还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甚至是对汉民族学，都是不公允或不公正的。

在世界民族冲突历史上，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那些严重的民族冲突（包括宗教冲突）往往是主体民族主义泛滥的结果。美国的 WASP 人（美国的主导民族，即信仰新教、讲英语的白种人）对非洲裔黑人、亚裔、拉美裔人的歧视，正是美国主体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是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和俄罗斯主体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此外，英国的北爱尔兰人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南亚斯里兰卡的僧泰冲突及其历史上僧迦罗主义的盛行、印巴冲突中的克什米尔人问题、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问题，都分别显露出英国、西班牙、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主义倾向。可见，主体民族主义问题绝不是少数国家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和上述国家的情况不同，国家采取向少数民族倾斜和照顾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现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大汉族主义的现象，把国学归于汉学，无疑就是这种大汉族主义在潜意识或无意识层面的表现。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用汉学偷换运国学概念的做法，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起码脱离不了偷运大汉族主义的嫌疑。

¹ 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报》2013年1月4日第6版。

²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邮箱：caoxing1865@sohu.com。



二、正确处理反思国学、汉学、儒学、孔学的关系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学在国内外也被推到了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台，也表现出正负两方面现象。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在国内外纷纷建立，激发了孔学、国学的发展。孔子学院有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10月，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和地区。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也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儒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世人的意识层面，普遍存在着误把国学视为儒学，甚至误把国学视为孔学，或者误把国学视为汉学的观念。

应当承认，孔学是儒学，儒学是汉学，汉学是国学。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国学就是汉学，汉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孔学。因为，国学包括汉学，但不止于汉学，还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汉学包括儒学，但不止于儒学，还包括道家、法家、墨家等更多诸家文化的学问；儒学包括孔学，孔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汉代以来，儒学发生了无数次的发展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就是从孔子的仁礼之学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和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孔学最大的缺陷是世界本原的不足，宋代程朱理学是儒学，但吸收了道家 and 佛家追问本原的思想成就，虽是儒学，但已不再是孔学了。

因此，从逻辑关系上看，国学、汉学、儒学和孔学是从大到小的包含关系——国学包含汉学，汉学仅是国学之一；汉学包括儒学，儒学仅是汉学之一；儒学包括孔学，孔学仅是儒学之一。这是国学、汉学、儒学和孔学的逻辑关系思考。此外，从孔学和儒学的世界影响来看，也不能认为儒学就是（中）国学，而应认定儒学是多国治国的思想和方略。儒学在韩国、在日本早已成为齐家治国的方式和做人规范。儒学在欧美，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无论是在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及现实层面上看，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国学仅仅是儒学或汉学，更没理由把中国的国学仅仅归于孔学或儒学。

三、误把汉学当国学的历史成因

“误把汉学当国学”的想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汉族及汉学形成的历史极为复杂。汉族与汉学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不是纯粹单一民族文化的产物。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汉族是多民族文化、多民族血液融合的产物。汉族由华夏族发展而来，其形成就是多元民族融合的过程，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夏商周既是三个朝代，同时也是三个族群（部落民）的聚合。周人本是小民族，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因担心当时大民族“商人”对当时统治和管理的合法性，所以建立“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法制度。

第二方面，在华夏民族形成后，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通过通婚、通商、长期移民等方式，一些周边民族自愿加盟到中原，与华夏族混血、融通为一体。从秦汉到明清，汉族进一步融合了更多的其他民族成分，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方面，在古代，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纷争不断，相互之间“有边陲，无国界”，边陲与国界的界限是经常变动的。甚至当时最强势的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并未止步于与中原的纷争，一两度入主中原，建立起了元朝和清王朝。其历史后果是，政治上军事上统治了中原，而在



文化上则更多的汉化了。另外，中原周边民族为了向中原文化靠拢，证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有的少数民族的首领谎称自己也是汉族的后裔。如，第一个在北方建立后汉王朝的刘渊是匈奴人，他称自己是汉朝公主的后代，汉朝的皇帝是他的舅舅。对此，《晋书·载记·刘元海》史料有证，“新兴匈奴人，……汉高祖以宗室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随着历史的演进，从夏商周到明清，汉族血液和汉族文化越来越不纯粹，越来越多地融合了周边民族的血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周边民族文化、特别是周边民族文化中那些实用性很强又很先进的成分。由于这种外来民族及其文化资源的加盟，使得中华民族有如不断滚动加大的雪球，不断加速了汉族及其文化的发展。这种历史运动，自然会造成某种历史的误解，即把汉族误认为是中国人，汉学就是中国学。如果从民族自称和他称的视角看，一方面汉族人自己自称为中国人，称汉学是中国学。另一方面，有些少数民族（无论是在中原之外居于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是已经移民至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加盟，也把自己称为汉族人，自愿同化为汉族文化之中。

如果考证具体的文献，不难发现，早在中国古代的周朝，就有把华夏当作中国的说法。《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其间把“中国”与“戎夷”并列起来。此外，民族学界和史学界，对于华夏族的看法，素有“五方之民”与“先有四夷后有华夏”的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这种矛盾并不是主观的误判，而是客观固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事物的本质就是矛盾，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从对立到统一，再从统一到分裂或升级为更高级的矛盾。早期华夏人居住的地区是“四夷”之间的中间地带，地理环境最好，文化融合最多，文化形态最先进，自然就成为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心，进而吸收着周边更多的民族。可以说，华夏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讲，汉族并不是原生态民族，而是衍生性民族。在历史上的中国地区，各部落民之间，通过战争、通婚、通商等方式进行的交流等方式进行融合，本身就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加盟。因此，在中原地带周边，很难做到纯粹的原生态民族，而在中原地带根本不可能形成纯粹原生态民族。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才会成为汉族。因此，汉族绝不是纯粹原生态、单一民族文化塑造，而是多族文化、多民血液融合的结果。我国民族宗教研究专家牟钟鉴提出“汉族是通和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的混血决定了宗教的混血。“民族的‘混血’，造成了宗教的‘混血’；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造成了多元通和的宗教模式。”从辞源上分析，“华”者“美”也，“夏”者“大”也。其实，这个文化之“美”和地盘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可以说，华夏族的融合性、扩大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王震中在其专著《简论邦国与王国》中称上古时代的中国是邦国。牟钟鉴提升为“古邦国”。刘尧汉认为，先有四夷，后有华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先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尔后才有华夏。华夏者，乃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也。”毛泽东也认为汉族是民族混血儿：“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成的。”

多民族融合形成了汉族，中国其他 55 个民族也是在历史中不断融合发展成了具有独特文化和传统的民族。因此，国学应该是包含 56 个民族文化的国学，不应该只是汉学。应该不断发掘 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充实和丰富国学。

